

# 文學



# 走近彼方 —— 論加里奧特·佩雷拉見聞錄中的“驚異” 和比較

Rogério Miguel Puga\*

“ [...] 如此新奇的模式和新穎的創造力實在令人百看不厭。”

引自加里奧特·佩雷拉：《中國見聞錄》，1989年版，第49頁（黑體字為作者所加）。

毫無疑問，想要描繪十六世紀的異邦文明即意味著需要採用一種方法，使一個或多個對象通過文字記載去感受並體會文章在說些甚麼，儘管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於是，無論對相同性還是對不同性的比較均是大多數民族遊記文學或口述文學中經常採用的手法。世界各地探索者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根據“口述”或者翻譯傳遞的信息系統地整理及總結其“生活方式”的方法去認識及瞭解各種資料。正如我們此刻所研究的文章的作者提到的那樣，把這種情況稱之為葡萄牙人和“中國人”語言交流的媒介並使之成為可能，<sup>1</sup>一旦在相遇後便出現接觸，並從中產生出無數反差極大的形象。

當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來到中國的時候，出現無數的論著企圖弄清這種在文化領域的文明究竟在哪些方面和歐洲的文明表現出相似或者不同。這些異國形象反映了這些論著作者如何運用他們的精神和文化框架去剔除各種信息的外殼，以便通過記述的方式有序地對其進行整理。<sup>2</sup>我們建議研究的這篇文章正是文藝復興時代人

---

\* F.C.S.H.——里斯本新大學

1. 據加里奧特·佩雷拉，《中國見聞錄》，載 Luís Albuquerque的《葡萄牙人關於中國的最初記載》（Primeiros Escritos Portugueses sobre a China），Alfa出版社出版，里斯本，1989年，第25頁 [1553-63]。該文葡文本第 版歸功於最近逝世的英國歷史學家 Charles Boxer 的著作“A Portuguese Account of South China in 1549 – 1552”，載“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卷XXII，羅馬，1953。
2. 據João da Rocha Pinto，《歐洲的目光：巴西印第安人的發現》（O Olhar Europeu: A invenção do índio brasileiro），載 Francisco Faria Paulino 著作《新世界的前夜：巴西》（Nas Vésperas do Mundo Novo: Brasil），1992，第49頁。

們這種“精神框架”和“可能意識”<sup>3</sup>的碩果，儘管中世紀的幻想仍存在於此類傳說之中。何思靈（Celina Veiga de Oliveira）和安東尼奧·阿萊斯塔（António Aresta）曾說過：

中國的形象是從澳門開始建立的。她並不是一個直到十六世紀還仍然存在的那種虛無飄渺、模糊不清、不可捉摸甚至不太準確的形象，而是恰恰相反，她是一種建立於直接接觸和對現實進行清晰觀察基礎之上的形象。為此，如果想要進入這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並且充滿神秘色彩的世界，就需要打開一個縫隙，撕開一個裂口，而西方便會藉此最終接近東方。澳門正是在這種意圖下出現的。<sup>4</sup>

然而，描述者的看法往往受到其身份、社會地位和個人及政治利益的影響。教士、殖民者和商人等，所有人就他們所觀察到的差異性為我們提供了不同形式的信息。

由於在歐洲航海者、商人、特別是傳教士與明朝中國居民之間的文明碰撞，在這兩個社會和文化世界之間開始形成互動性的反差，這個過程始於馬六甲，最後以漸進的形式於1517年發展到中國。

我們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建立或者總結令踏著在中國生活了十七年的（1275年－1292年）馬可勃羅的足跡在中華帝國的土地上遊歷的葡萄牙人驚嘆不已的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表現形式。<sup>5</sup>該項研究亦將通過探討各種比較而進行，特別是對（葡萄牙和歐洲）已經有所瞭解的加里奧特·佩雷拉在微觀上對其周圍的異國風情現實進行的比較，以及對其它同樣屬於異國風情但對於葡萄牙來說更為熟悉的方面進行的比較（比如印度和果阿）。

這種對中國的好奇和興趣體現在唐·曼努埃爾國王在奧麥林發佈的軍事命令中。他通過此份文件於1508年委託迪奧格·洛佩斯去馬六甲瞭解關於這個國家的種種情況：

要瞭解中國人來自哪裡，有多遠，是甚麼時候來到馬六甲或者其他屬其管轄的地方的，帶來的商品是甚麼，每年來多少

- 
3. 我們在此使用的兩個字眼由João da Rocha Pinto用於其上述著作，分別引自L.Febvre的著作《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16 e siècle》，Albin Michel出版，巴黎，1943年，和L.Goldmann的著作《Marxisme et sciences humaines》，Gallimard出版，巴黎，1972年。
  4. 據何思靈和António Aresta，“相互瞭解的檔案：澳門歷史的一種文化觀”（Arquivos do Entendimento: Uma Visão Cultural da História de Macau），澳門基金會，澳門，1996，第23頁。另見Luís de Albuquerque主編的《葡萄牙人大發現歷史詞典》（Dicionário de História dos Descobrimientos Portugueses）中João Paulo Costa撰寫的詞條“中國”，卷一，Editorial Caminho出版社，里斯本，1994，第248-249頁。
  5. 參閱何思靈和António Aresta的上述作品第19頁和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的著作《神話和商品，航海的烏托邦和實踐》（Mito e Mercadoria, Utopia e Prática de Navegar），Difel出版，里斯本，1990。Fernand Braudel亦在其著作《多種文明的演繹》（Gramática das Civilizações，Teorema出版，1989）中聲稱“… [曾經] 在一次風暴的襲擊下，中國船隻不得不繞過好望角，從而發現了美洲…”。

船隻，船隻的形狀是甚麼樣的，是否來的當年就返回去，在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有商棧或者永久住房，他們是否富有的商人，男人們是否比較瘦弱，是否好戰，是否有武器或者大炮，他們的穿著是怎樣的，身材是否高大，以及關於他們的其他所有信息，比如他們是否信仰基督，是否異教徒，他們的國土是否很大，是否有多個國王，他們之中是否有不奉行其信仰或不遵從其規矩的摩爾人或者其他種，如果他們不是基督徒，他們信仰或者崇拜的是甚麼，他們的風俗習慣是甚麼，他們的領土與何處相連。<sup>6</sup>

上述摘錄指明了葡萄牙國王認為瞭解中國十分重要的有關資料：

- 1) 中國人帶來並進行貿易的產品是甚麼，他們從哪裡來，其頻繁程度如何。
- 2) 其行為舉止、身材長相及衣著打扮如何。
- 3) 其信仰如何。
- 4) 其國家大小及管理方式如何。
- 5) 其他有用的資料。

波爾塔萊格列的主教阿馬多爾·阿拉依斯修士（Amador Arrais）（1530年 – 1600年）曾在其《對話》一書中就上述問題作了回答：

[...] 根據我掌握的情況那裡確實很大。[...] 中國人心靈手巧，精於製造。有的人勇猛無比，善於打鬥；有的人聰明機智，手藝高超。所有地區都土地肥沃 [...] 所有人在飲食上都十分新奇 [...] 器皿齊全，乾淨清潔。他們喜歡穿著棉布、羊毛以及用金線編織的絲綢製作的衣服 [...]。熱衷於遊戲、玩樂，喜歡女人、樂器、占卜算命。[...] 房屋陰涼、寬暢、造型美觀。廟宇高大，供奉許多雕像和壁畫 [...]。<sup>7</sup>

國家的大小，管理方式，國家的法律和秩序以及其人民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描繪明朝時期的中國及其當時十三個省區生活方式的主要內容和感到驚異的緣由。中國人和被其稱為“大鼻子洋人”的歐洲人逐漸解答了他們長期以來彼此在相處及學習過程中感到的強烈好奇。許多不同的作者都談到傑出的中國人不斷擺在他們面前的無數問題，特別是加里奧特·佩雷拉在他的《見聞錄》中所談到的：“...在福州城的時候，他們曾多次把我們從監獄中押出來，然後把我們帶到大戶人家，以便讓從來沒有見過葡萄牙人的他們及他們的女人見識一下我們，並瞭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風俗和許多其他方面的事。他們把這些都用筆記下來，以滿足他們的極大的好奇心 [...]。”<sup>8</sup>然而對於作者文章中的“我”來說，他除了被人看以外，他也看到了對方。

6. 據 Bulhão Pato 和 H. Lopes de Mendonça 《Afonso Albuquerque 的信函》（Cartas de Afonso Albuquerque），卷二（1508年2月13日的軍事命令），里斯本，1884-1935。

7. 據 Amador Arrais 《對話》（Diálogos），Clássicos Sá da Costa 出版，里斯本，1994 [1589]。作者於其開始此項研究的兄弟 Dr. Jerónimo Arrais 去世後對文章作了補充。

8. 據加里奧特·佩雷拉著作，引自第34頁。

加里奧特·佩雷拉是在高安縣被捕的，後來被押送到福州。他於1553年逃到上川島後便在那裡開始撰寫他的《見聞錄》。這篇著作作為一份報告的附件由果阿神學院的耶穌會士帶到歐洲。文章先後被翻譯成意大利文（1563年）和英文（1577年）。該文“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情況和社會情況[……]因為作者在作品中總結了人類差異性的方方面面，而這在當時祇有少數作者曾小心翼翼地提到過。”<sup>9</sup>

加里奧特在他的作品中對於他剛剛認識的現實使用了歐洲人的觀念，比如他把中國（他認為是王國）的皇帝稱為“國王”<sup>10</sup>，因為這對於歐洲國家來說已經是最高地位了。於是，我們發現在遊記文學中，人們都是用歐洲的有關資料去聯繫或者確定相類似的現實，而這從另外角度講對第三者是很難描繪和解釋的。<sup>11</sup>當描寫道路、省區和人口密集的地區以及國家的行政管理體制時，作者最終以誇張的口吻承認說“一切運作都井然有序，以至於可以老實地說這是全世界管理得最好的地方”。<sup>12</sup>這種面對差異的同一驚嘆亦表現在作者對一座大橋的描述上：“……橋非常之大，無論在葡萄牙或者其他地方我都不知道有這麼大的橋。有人對一位同伴說這座橋有四十個橋拱。”加里奧特還說“整座精心建造（即工藝精良）的大橋的橋欄是羅馬式的，其舉世無雙的樣式令人驚嘆不已。”<sup>13</sup>

橋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至於作者無法在葡萄牙甚至歐洲能找到與中國這個工程相比擬的建築物，並且以其同伴的話作為旁證來說明他所強調的那座橋有四十個橋拱。正是這第二位葡萄牙人向他講述並傳遞了信息，從而更加印證了盧濟塔尼亞的旅行者“不見不知道”的格言。<sup>14</sup>作者回過頭來又強調那座橋的獨特性，亦提到所有看到那座橋的人所表現出來的驚異，並肯定該橋的建築風格是歐洲羅馬式的。因此，就使得歐洲人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將內容及形式相互易位，也就是說，直接或間接的比較一直存在於旅行者的腦海之中，他們套用已知的世界去分析此刻才被揭示的世界。對於不同點的比較亦如此進行：“……這些橋的橋拱和我們的不同，[……]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長度上，這些橋的工程都無與倫比，令我驚奇不已”，<sup>15</sup>或者“……在他們的廟宇裡，[中國人]設有很大的祭壇[……]”。<sup>16</sup>這種比較還出現在描繪中國動物的含蓄議論中，對此作者引述這樣的話：“……那裡沒有綿羊，人們賣雞時要量度重量，這種辦法也用於其他動物。”<sup>17</sup>同歐洲相比沒有綿羊，而在歐洲許多動物不是像在中國那樣靠稱重量出售的。

---

9. 據Rafaella D'Intino著作《Enformação das Cousas da China: Textos do Século XVI》，IN-CM出版，里斯本，1989年，第99頁。

10. 加里奧特·佩雷拉著作，引自第15頁。

11. 關於遊記文學研究和亞屬文學以及其文化要素，可參閱Fernando Cristóvão著作《遊記文學的文化要素：研究和書目》（Condicionantes culturais da Literatura de Viagens: Estudos e Bibliografias），Cosmos-CLEPUL出版，里斯本，1999年。

12. 同前，第16頁。

13. 同前，第18頁。（其中黑體字為作者所加）

14. 據賈梅士著作《葡國魂》，由Emanuel Paulo Ramos修訂及作註，波爾圖出版社，波爾圖，1987年，第188頁（第IV章，94）。

15. 據加里奧特著作，引自第18頁。

16. 同上，第24頁。

17. 同上，第19頁。



中央帝國被描繪成十全十美的王國，這不僅表現在公共行政管理上，亦表現在美學和建築藝術上。這就不斷地使在中國皇帝的領地上遊歷的歐洲人產生驚異的感覺，認為“中國人”喜歡“消遣享樂”。道路完善，“…我們覺得所有看到的東西在全世界各地都沒有中國製造得那麼好。”在這裡，讚揚直接指向中國人民，並在飲食和勞作方面與世界其他地方作了“彼”和“此”的新的比較：

a) “[…]所有中國人都用大桌子吃飯，以和我們相同的方式坐在他們的椅子上。桌子十分乾淨，不用桌布和餐巾，這是因為所有端上來的食品都已預先切成小塊，而且必須根據習慣用一雙筷子來吃，就像我們用勺子一樣，無需用手去碰食物[……]。在用餐過程中男人們招呼一切，十分有禮，在這方面比任何民族都要強許多，他們根據風俗習慣在言談舉止待人接物上亦如此。他們十分精明能幹，勝過所有異教民眾及摩爾人，使我們羨慕不已。”<sup>18</sup>

b) “這裡的青蛙同雞一樣貴。他們食用[……]狗、貓、蟾蜍、老鼠和蛇。”；

c) “農民擁有牛是為了耕田，而且根據這裡的習慣是用一頭牛耕地[……]因為他們作一切都憑藉智慧，而我們則憑藉力量。”<sup>19</sup>

在上述第一段引用的文字中，作者再次使用推理的方法比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風俗習慣，使我們想起人類學方面的起源，即許多學者整理研究十六世紀的遊記及旅行探險資料成了“原始人類學”工作的一部份。這種方法亦運用於對彼方異國風情的研究之中，通過疏遠母體文化而對後者的風俗習慣進行評論。於是，文中便包括那些值得我們羨慕的良好的中國習俗，以及主持正義的方式：“現在我將談到中國人司法的方式和風格，以便瞭解異教徒和我們基督徒兩者之間的優劣，有必要弄清其真實性和正確性。”<sup>20</sup> 作者在這裡又一次突出了世俗和宗教的二分法：即基督徒（此方）和異教徒（彼方）。這種差異亦體現在對中國奇異植物的描述上：“…有一種我們沒有見過的不同的大樹，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奇特的叢鬱樹林。”<sup>21</sup> 同時用鸞鷲捕魚亦令其印象深刻。確實，作者以一種誇張的口吻承認：“…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sup>22</sup> 同一經歷在葡萄牙耶穌會士麥安東一五八五年作的記錄中亦有描述，他當時在意大利神父羅明堅陪同下正在中華帝國旅行。他說：“我們按照中國人的衣著打扮從廣東省城乘船去一個叫南海的城市[……]。沿河我們看到如同捉兔子一樣的十分奇怪而有趣的捕魚方法。許多中國人在船上訓養大量像鸞鷲一樣的禽類[……]。”<sup>23</sup>

18. 同上，第24頁（黑體字為作者所加）。亦可參閱 João de Barros 作品《Décadas》，（III, Livro II, C. 7），其中描繪了中國如何用餐的奇特方式。

19. 同上，第19頁（黑體字為作者所加）。

20. 同上，第26頁。

21. 同上，第48頁。

22. 同上，第49頁。

23. 據麥安東神父和羅明堅神父在中國內地的遊歷（1585年）：阿儒達圖書館，編號49-V-1（頁154-156）：《Ásia Extrema. Entre nella a Fé, promulga-se a Ley de Deos pe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第一部份。作者為中國耶穌會神父 António de Gouvea，1644年。未刊行之資料來源由 Horácio Peixoto de Araújo 轉抄自 Fernando Cristóvão 的著作《傳教事業在東方的發展》[Expansão missionária no Oriente]，第365-367頁。

對於加里奧特說來，葡萄牙人在觀察中國人生活方式時就應當向他們學習，而不僅僅是依靠使用力量。毫無疑問，中國人在禮儀方面堪稱舉世無雙的代表性民族。

接著，加里奧特通過對風俗習慣進行比較來分析三種相互並列的不同文化：“[……]對於食品來說，如果在像印度的地方，世俗人不吃雞、牛和豬，除非是葡萄牙人和摩爾人[……]。但是，中國人很自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吃家[……]。”<sup>24</sup>接著，他又再次使用比較的方法將不同文化並列起來，並以人類學的知識進行總結：“在摩爾人、世俗人和猶太人之間各自有著不同的發誓方法。摩爾人以可蘭經發誓，婆羅門教徒以繩發誓，猶太人以摩西五書（即舊約全書前五卷）發誓，如此類推，各種不同的異教人士均以其所鍾愛之物發誓。對於中國人來說，他們亦發誓，但一般是對上天，對月亮、對太陽，甚至對自己崇拜的偶像發誓。”<sup>25</sup>

在解釋中國公共行政的隸屬關係時，作者使用了中國行政官員的不同頭銜，然後或者通過概念解釋或者用葡萄牙的相應頭銜進行翻譯。這樣，“loutia”就成了“大人”，而總督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歐洲]公使”。<sup>26</sup>涉及到語音學範疇及對文明化了的“彼方”和“此方”進行比較時，我們還注意到該文章作者就國家名稱的不同發音對葡萄牙人及中國人造成的問題：“我們稱這個國家為‘中國’，而將這裡的人稱為‘中國人’，但由於我們在這裡被囚禁的整個期間從來沒有聽過在當地居民中有人這樣稱呼，我決定弄清究竟是怎麼回事[……]，於是我對他們說葡萄牙人選擇國家最古老的城市名稱作為國家名稱，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為王國取名的。[……]因此，是不是這裡也有一個古老的城市叫作中國。可是他們總是回答說沒有這個城市。”面對“葡萄牙”名稱本身的詞源學解釋和似乎沒有解決的疑問，加里奧特採取了一種曲解與其對話的中國人所作出的回答的策略，這一策略十分有效，證明了作者在語言上的機敏性：“我問他們的是整個國家的名稱，而他們中被問到的那個人可能以為問他是哪個民族的，因此作了以上回答。”<sup>27</sup>

對於語言解碼或者翻譯，同樣要求使用比較法，儘管是十分含蓄的：“[……]比如我們說‘Deus o sabe’（上帝知道），而他們卻說‘天曉得’。”<sup>28</sup>然而，由於信息量太大，以至於加里奧特承認說“由於在這方面名目繁多，種類不同，無論對於名稱還是對於職銜都不能作出理想的統計[……]因為儘管大家說的是同一些事物的名稱，但彼此之間卻有很大差別”。<sup>29</sup>

---

24. 據加里奧特·佩雷拉著作，引自第19頁。

25. 同上，第28頁。Rui Manuel Loureiro 認為婆羅門教徒用的“繩”是該教的印度修士斜掛在身上用三股線編成的繩子。[《十六及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的中國觀：文件匯編》，載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第三十一期，1997年，第56頁。]

26. 同上，第26頁。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外來語言的稱謂形式問題。

27. 同上，第36頁。

28. 同上，第24頁。

29. 同上，第19頁。（黑體字為作者所加）。在第29頁亦講到：“關於此地的法律，我將盡可能進行介紹。”



於是，此時讀者便會面臨維克托·賽加林（Victor Segalen）稱之謂“美學差異”的問題。<sup>30</sup> 這種差異勾勒出已知世界和在許多情況下對於第一眼看到另一種文明的人來說無法理解的世界之間的輪廓，因而驅使他們通過自己的微觀世界和逐漸成為觀察者擁有物的另一個世界的比較去認識他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無數對應論者力圖在新事物和已知事物之間建立這樣一種聯繫，即“…福州這個城市到處是水，河道密集[…]，以至於使我們會想像到是身處威尼斯[…]。”<sup>31</sup> 在歐洲，無論是斯德哥爾摩（瑞典）還是布魯日（比利時），均由於該等城市擁有許多河道和豐富水源而同樣被稱為北歐的威尼斯。在描繪 Vão Follí 的大屋時，加里奧特面對過於高大的建築物採用了另一種比較方法，以便讓讀者對其所看到的現實有一個概念：“…圍牆[…]和果阿的圍牆一樣大。”<sup>32</sup>

本人承認，一個人在“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物包圍之中會自然產生驚異感，而本文標題就用了這個詞，因為讀者面臨的所有這種驚異都會由於一些描述段落快速越過我們的視線而通過本人稱之謂“流水般的描述”而得到演繹和解碼。而這種效果必須通過作者使用比較的方法才能達到，以便讀者能夠感受到或者想像到“有得看的事物”。<sup>33</sup> 其中一件使葡萄牙人對當地“異教徒”感到驚異的事實是在那裡有專為窮苦人和老年人設置的醫院和公共住所，即社會福利設施。於是加里奧特承認：“在整個這一期間，我們沒有見過任何一個窮人沿門乞討”。<sup>34</sup>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在《遊記》一書中亦談到這些設施（見該書第CXII和CXIII章）。

這位葡萄牙人在廣西省遇見許多不同的民族，包括韃靼人、蒙古人、印度人和老撾人，“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他們的面部長相就是區分他們的標誌。印度女人用布巾包頭，這是與其他種族婦女特別是與其同行的“黑人女傭”相互區分的標誌。這種形象在南蠻藝術屏風中亦有描繪，在類似的藝術作品中還可以看到在葡萄牙船上工作的非洲黑人。<sup>35</sup> 這樣，在這部作品中就出現了不同的人種，有本地人，亦有中國附近的人、歐洲人、非洲人等等。這些千姿百態的不同人種和

---

30. 見 Victor Segalen 著作《Essai sur l'Exotisme》，Livre de Poche 出版，巴黎，1999 [1955]。

31. 見加里奧特·佩雷拉著作，第34頁。

32. 同上，第48頁。

33. 在文章第35頁中，作者使用了“驚異”詞，而我們發現相同的用法共出現四次。這明確地向讀者表明了中國對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旅行者造成的強烈感受和衝擊。第38頁亦有“祇有親眼見到才能相信”的說法。在第39頁中，說到船上的衛生和良好條件令葡萄牙人感到“非常”吃驚。

34. 見加里奧特·佩雷拉著作，第37頁。

35. 同上，見第45頁。作者所提到的他所遇到不同性別的人這一事實為他帶來一個屬性問題，因為很可能他僅僅是想遇到經商的男人。加里奧特後來敘述了這些女人們是如何打發日子的。正如 N. C. Mathieu 說：“Toutes les sociétés élaborent une grammaire sexuelle (du «féminin» et du «masculin») sont imposés culturellement au mâle et à la femelle) mais cette grammaire –idéale et factuelle– outrepasse parfois les «évidences» biologiques D'où l'utilité des notions de «sexe social» ou de «genre» [...] pour analyser les formes et les mécanismes de la différenciation sociale des sexes.” [《Sexes (différenciation des)》]，載於 Pierre Bronte 和 Michel Izard 著作《Dictionnaire de l'Ethnologie et de l'Anthropologie》，PUF 出版，巴黎，1992年，第660頁。

異國事物以及風俗習慣使《見聞錄》一書的作者忙碌不已，正如作者在其文章結尾處肯定同時被本文開頭引用的那段話所說的：“[…]如此新奇的模式和新穎的創造力實在令人百看不厭。”<sup>36</sup>

圍繞異質性而形成的體驗、感覺和好奇心表露無遺，並隨著行程的進展而形成觀感。此種現象亦出現在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著作《遊記》第一版的書名頁上：“對於我在中華王國所看到的及所聽到的許許多多奇怪的事情，[…]在我們西方這裡很少知道或者聞所未聞。”<sup>37</sup>

對異國事物的興趣產生於復興時代的歐洲，而經葡萄牙人之手而變得系統化甚至“科學化”。正如令人懷念的馬麗婭·列奧諾爾·加瓦良·布埃斯庫（Maria Leonor Carvalhão Buescu）教授所說：

“當超越了不可交往性或艱難的手語溝通階段之後，葡萄牙人對異國興趣追求的經歷就是人類尋求理解的經歷，他從零開始，通過第一次發生的或者碰巧遇到的然而總是不確定的接觸，發展到全面的相互認識，而這正是追求異國興趣者的最終偉大目標。”<sup>38</sup>

比較總是不自覺地出現在旅行者的頭腦之中，一如任何旅遊者所體驗到並且肯定的那樣：“這在我們國家是不一樣的！”。企圖對異質性進行確認要麼是通過推理程序，要麼是通過區分觀察，將不同的現實進行對照，甚至要想辦法將相距遙遠的現實拉近，儘管有時要把異質進行總結。描述涉及到驚異和對價值的判斷，要參照遊歷者（homo viator）在對事物進行觀察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異質性。在整個十六世紀，這些遊歷者所擁有的新的認識與無聊小書的“淺薄”認識有很大不同。這種認識同驚異共同存在於《見聞錄》的整個敘述之中，而能夠證明這一點的便是比較及對照手法的運用以及對彼方物質、精神甚至感到怪異方面的透視，並且將其確定於與歐洲人習慣看法極度不同的自然和人群之中。於是，在文明的兩極之間通過認識論的展望便出現了歐洲對東方異邦的認識<sup>39</sup>，而這一點正好貫穿於我們所研究的這篇著作的始終。

---

36. 見加里奧特·佩雷拉著作，引自第49頁。（黑體字為作者所加）

37. 據 Fernão Mendes Pinto《遊記》，由 Adolfo Casais Monteiro 轉載，IN-CM 出版，里斯本，1988年，（本摘錄的調整由本文作者負責）。

38. 據 Maria Leonor Carvalhão Buescu 著作《O exotismo ou a “estética do diverso” na Literatura Portuguesa》，載馬德拉群島舉辦的《遊記文學：傳說、故事和神話》研討會論文集，Cosmos 出版，里斯本，1997年，第578頁。

39. 據 Tzevan Todorov 著作《Nous et les autres》，Seuil 出版，巴黎，1989年。